

以新质生产力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沈坤荣 程 果 赵 倩

[摘 要] 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区别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新”强调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质”则强调新质量、新质态。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助力世界经济复苏的主动选择，又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重中之重，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转变发展方式，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有助于发展“三新”经济，打造新增长引擎；有助于提升供给体系对需求的适配性，扩大有效需求。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在于，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性布局未来产业，实现生产力跃迁。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为了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加强基础研究，筑牢科技自立自强根基；发展新型人力资本，强化高水平人才支撑；健全现代金融体系，着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基础；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战略性新兴产业 未来产业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4) 04-0087-07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① 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② 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发展”。^③ 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时期，新一代信息、生物、能源、材料、海洋等领域的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呈现交叉融合、群体跃进、多点突破态势。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抢占科技制高点、提升国家竞争力的主动选择，又是夯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物质技术基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基础、能力结构与推进机制研究”（19ZDA04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沈坤荣，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程果，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赵倩，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后（江苏南京，210093）。

① 《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人民日报》2023年9月10日。

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12月13日。

③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

的内在要求。

一、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

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生产力是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能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①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而把科学技术视为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观点。^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③而生产方式和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就体现出科学技术的作用。随着生产力向更高层次发展，科学技术除了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也在独立发挥作用。马克思基于对工业革命的观察，指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它为资本服务”，“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④此外，在分析劳动生产力的决定因素时，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⑤劳动生产力的决定因素除了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外，还包括科学的发展水平以及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论述高度肯定了科技创新的革命性力量，科技创新能够推进生产要素变革、统筹各类生产要素协调发展，其重要性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凸显。^⑦

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科学技术与生产要素结合的程度、质量、水平差异，反映了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包括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其中生产资料又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⑧科技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赋予生产力三要素新的内涵。从劳动者来看，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者是能够使用现代科学技术、适应高端先进设备、具备知识水平提升和迭代更新能力的高水平人力资本生产者；从劳动对象来看，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数据与其他生产要素的协同联动有力推动了生产力跃迁；从劳动资料来看，算法作为新劳动工具，催生人工智能、脑机接口、数字孪生等先进数字技术。与传统生产力不同的是，新质生产力具有高技术、先导性、前沿性和革命性的特征。新质生产力的“新”强调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以科技创新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质生产力的“质”则强调新质量、新质态，^⑨通过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质变”，引致生产力跃迁。^⑩

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变革、引领高质量发展。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科技创新在不同时代均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引发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和人类社会的重大进步。根据新熊彼特学派的观点，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大致发生了六次技术革命。^⑪第一次技术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珍妮纺纱机”在棉纺织业的发明使用引起技术革新的连锁反应，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第二次技术革命大致是从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30年代，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为标志，大机器生产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方式，实现了生产力的飞跃；第三次科技革命始于19世纪70年代，以电力、内燃机和化学技术

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编写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页。

② 杨春学：《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学动态》2021年第9期。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00、70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4页。

⑥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3页。

⑦ 马昀、卫兴华：《用唯物史观科学把握生产力的历史作用》，《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⑧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08页。

⑨ 沈坤荣、金童谣、赵倩：《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南京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

⑩ 周文、许凌云：《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改革》2023年第10期。

⑪ 也有部分学者从产业变革的角度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进行划分，如克劳斯·施瓦布的著作《第四次工业革命》将自18世纪末蒸汽革命以来的技术进步按时间分为四个阶段。因此，从产业变革的视角来看，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可被视为“第四次工业革命”。

的大规模应用为标志，再次推动了生产力的跃迁；第四次技术革命始于 20 世纪初，以石油化工和汽车制造为标志，人类社会由此进入石油时代；第五次技术革命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 20 世纪中期，计算机技术、网络通信技术等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方方面面，人类社会由此进入信息时代；2010 年前后兴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可被视为第六次技术革命。^① 历次科技革命表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将引发产业变革，形成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而“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② 例如，蒸汽机的发明带来发动机的革命，使人工逐渐被机器替代，“正是工具机的创造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一旦人不再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而只是作为动力作用于工具机，人的肌肉充当动力的现象就成为偶然的了，人就可以被风、水、蒸汽等等代替了”；^③ 电力的发明使发动机从蒸汽机变成电动机，而信息技术的应用是继蒸汽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之后科技领域的又一次飞跃；新一轮科技革命属于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 GPT）革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具有渗透性、替代性、协同性和创新性等特征，能够融合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多个生产环节，改变经济发展范式，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④

二、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背景

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助力世界经济复苏的主动选择，又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重中之重，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

第一，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助力世界经济复苏的主动选择。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从“一超多强”迈向“多元、多极”。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深刻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另一方面，受到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全球经济增长明显回落，各经济部门以及地区之间的分化不断加剧，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速低迷，而 2020 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此外，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局部摩擦冲突不断，全球性问题加剧。多重因素叠加使得全球经济增长整体上呈现乏力的态势，^⑤ 亟需通过生产力的结构性变革增强发展新动能，进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

第二，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重中之重。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以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为新兴产业领域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把握新科技、新产业带来的宝贵发展机遇。此外，在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的集中涌现使得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风险大幅上升，而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谋求技术独立的关键。

第三，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

① 马文君、蔡跃洲：《新一代信息技术能否成为动力变革的重要支撑？——基于新兴产业分类与企业数据挖掘的实证分析》，《改革》2020 年第 2 期。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440 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432 页。

④ 陈楠、蔡跃洲：《人工智能、承接能力与中国经济增长——新“索洛悖论”和基于 AI 专利的实证分析》，《经济动态》2022 年第 11 期。

⑤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3 年 10 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的预测，全球经济增长将从 2022 年的 3.5% 降至 2023 年的 3%，2024 年降至 2.9%，远低于 2000—2019 年 3.8% 的历史平均水平。根据世界银行 2024 年 1 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的预测，全球经济增长将连续第 3 年放缓。

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①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资源环境约束增大,劳动、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下降,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三、以新质生产力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内在逻辑

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以新质生产力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内在逻辑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有助于转变发展方式,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从创新发展来看,科技创新在历次科技革命中均扮演了关键角色,特定领域的重大技术创新引致新兴产业发展和主导产业更替。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降低要素投入、扩展可利用生产要素的范围,能够突破生产要素的现有约束条件。特别是以引入新技术、新产品或服务为特征的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创新,通过推动新技术扩散、渗透、融合,能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通过壮大关联产业和赋能其他产业,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撑。从绿色发展来看,粗放型增长模式带来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问题。例如,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但能源利用效率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②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而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通过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可以壮大绿色产业链供应链,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经济体系。

第二,有助于发展“三新”经济,打造新增长引擎。“三新”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的经济活动集合。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10084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4%,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3D打印技术为代表的技术进步,推动先进技术与其他技术领域实现跨界协同,给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带来了深刻变革。一是创造新产业。数字产业化通过数字技术应用催生新产业,产业数字化则是传统产业在数字技术发展不断分化、升级、融合的背景下衍生新产业。二是创造新业态。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微商电商、网络直播等以互联网为依托开展的经营活动蓬勃发展,通过商业流程、服务模式或产品形态创新提供更加灵活便捷的个性化服务。三是创造新商业模式。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创造新的发展机遇,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商业模式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市场竞争格局。

第三,有助于提升供给体系对需求的适配性,扩大有效需求。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持续改进生产工艺、优化生产流程,提升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拓展新的应用场景,进而创造引领新需求。一是创造消费需求。可穿戴设备、数字家庭、智能服务机器人等新产品丰富了消费形态,带动消费升级;“直播带货”“数字文创”等新商业模式优化了消费场景,带动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快速增长;线上娱乐、远程教育等新业态蓬勃发展,推动消费规模扩张。二是扩大投资需求。新质生产力聚焦传统产业焕新、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不仅企业“智改数转”产生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需求,而且新产业的发展也创造新的投资需求。三是拓展贸易需求。数字技术深刻改变了国际贸易体系和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一方面,电商平台降低了贸易成本,丰富了企业的数字信息,提高了贸易的便利性,拓展了传统贸易需求;另一方面,数字贸易作为新型贸易形态,成为国际贸易的新亮点,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

^①《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

^②能源消耗强度反映创造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量,是衡量能源利用效率的主要指标。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2》,2021年采用现价汇率计算的中国能源消耗强度为8.89,远高于6.19的全球平均水平和3—4的主要发达国家水平。

四、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和产业版图,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成为国际竞争的新赛道。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在于,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性布局未来产业,实现生产力跃迁。

(一) 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颠覆性技术是“改变游戏规则”“重塑未来格局”的革命性力量,能够引发技术的链式突破。2019年,欧盟委员会发布的《面向未来的100项重大创新突破》筛选了100项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颠覆性技术,分为9大类,包括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人机交互和仿生、电子与计算机、生物交叉学科、生物医学、印刷与材料、突破资源边界的技术、能源、社会领域的重大创新突破。例如,3D打印技术、柔性电子、脑机接口、情绪识别、量子计算机等,以及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对世界经济产生颠覆性影响。2024年2月20日,广州颠覆性技术创新园项目开工,发布全国首个全面支持颠覆性技术创新项目的政策举措——《广州开发区、广州市黄埔区、广州高新区支持颠覆性技术创新若干措施》(简称“颠覆性10条”),致力于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化集群化”全周期一体化支撑体系,扩大颠覆性技术创新“项目种子库”“人才蓄水池”。展望未来,需要构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持续加大颠覆性技术的攻关力度,以颠覆性技术突破换来长远发展主动权。

前沿技术是各技术领域最先进甚至是“从0到1”的技术,具有前瞻性、先导性和探索性,为未来高新技术更新换代和新兴产业发展奠定技术基础。例如,生物芯片、靶标发现、基于干细胞的人体组织工程、基因操作和蛋白质工程等前沿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能够带来诊断、治疗等方面的重大医学突破;虚拟现实、智能感知、人机交互和网络安全系统等信息技术能够推动多领域的变革创新;新材料、先进制造和先进能源等技术的不断突破能够带来更加高效、经济、绿色、清洁的发展方式;深海作业技术、天然气水合物开发技术、海洋环境立体监测技术等海洋技术能够极大提升海洋资源利用效率。

(二) 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性布局未来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处于科技和经济发展前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核心竞争力。自2010年中国提出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来,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呈现持续快速增长态势,^①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动力源。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13%,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28.4%。^②在数字经济时代,随着数字技术逐渐成熟,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发展需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双轮驱动作用。例如,贵州贵阳自2015年创建国家级大数据产业发展集聚区,充分发挥大数据先发优势,大力发展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战略性、先导性产业,被誉为“中国数谷”;江苏无锡自2009年被国务院批复成为全国首个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试点城市以来,大力发展物联网产业,目前已形成覆盖传感器、感知设备、智能硬件、信息通信、应用服务的物联网全产业链,主导制定超过一半的物联网领域国际标准。

未来产业是指尚处于孕育孵化阶段,具有高成长性、战略性、先导性的产业。未来产业依托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的突破和产业化,将改变原有产业形态和产业体系,甚至带来技术经济范式的变化,引发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近年来,发达国家纷纷加强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先进制造、生物技术、先进通信网络等前沿领域的谋篇布局,提前谋划颠覆性、变革性产业发展,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机。“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要前瞻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2022年11月28日,科技部、教育部发

^① 李文军、郭佳:《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成效、挑战与应对》,《经济纵横》2022年第8期。

^②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主要内容的统计指标体系。

布《未来产业科技园试点及培育名单》，将空天科技未来产业科技园、未来能源与智能机器人未来产业科技园等10家作为未来产业科技园建设试点。2023年8月28日，工信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2023年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揭榜挂帅工作的通知》，面向元宇宙、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通用人工智能等重点方向发布揭榜挂帅榜单，聚焦核心基础、重点产品、公共支撑、示范应用等创新任务，旨在发掘培育一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具备较强创新能力的优势单位，突破一批标志性技术产品，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落地应用。前瞻性布局未来产业，需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产业体系完备优势，根据各地经济、产业、科技发展特点，通过梯度转移和产业内分工，形成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雁型列阵。

五、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政策选择

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为了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加强基础研究，筑牢科技自立自强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①基础研究处于知识和创新链条的上游，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瞄准重要基础研究，从源头解决关键技术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能力还相对薄弱，并跑、领跑的领域不够多，而加强高质量科技成果的源头供给是实现“从0到1”的原始创新的关键。一是瞄准前沿领域的关键问题。要强化重大战略问题意识，聚焦前沿领域的基础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难题，加强对基础软件、核心芯片、核心元器件等基础性和关键共性数字技术的研发投入，鼓励“联合项目”“揭榜挂帅”等重大技术攻关机制创新，提升先进制造技术的供给能力。二是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要以“原始创新突破”“重大理论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重大紧缺技术突破”为导向，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推动国家重点实验室优化重组，加快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组建前沿基础研究创新平台，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提高科技创新能级。三是改革科研评审制度。与应用研究的市场导向不同，基础研究的“投入—产出”绩效相对较低，部分重大原创性成果往往需要多年持续的资金、技术、人才投入。因此，要完善科研人员的创新成果奖励机制，切实为科研人员营造风清气正、追求卓越的创新生态。四是加快推动基础研究成果落地转化和产业化。要整合“产业—企业—研究院（大学）”多方资源，发挥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中的主导作用，打通基础研究成果向新质生产力转化“最后一公里”。

第二，发展新型人力资本，强化高水平人才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强调，“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②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要大力发展新型人力资本，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一是要聚焦攻克战略性、基础性、共性技术，全方位培养面向前沿技术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和研发团队，积极引进高端人才，集聚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等“高精尖缺”人才，加快形成前沿技术人才中心。二是要适应数字化、智能化、终身化、融合化的教育发展趋势，构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等全方位人才培养模式，培育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高技能劳动者队伍。三是要构建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机制，建立以人为本、尊重贡献、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人才评价体系。

第三，健全现代金融体系，着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科技创新往往具有周期长、不确定性和风险较高的特点，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充分发挥金融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枢纽作用，而现有金融服务体系难以实现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为此，需要健全现代金融体系，着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一是要促进金融机构改变“短久期”模式，从“长期主义”视角出发，不断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二是要积极发挥资本市场赋能作用，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例如，

^① 习近平：《加强基础研究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求是》2023年第15期。

^② 《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5月6日。

科创板自 2019 年开板以来,聚焦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①推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长足发展,促进“科技—产业—资本”的良性循环。三是要设立专项引导基金,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单项冠军企业、隐形冠军企业等发展壮大,为高新技术企业创造更加宽松的融资环境,确保金融活水“精准滴灌”。

第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基础。产业是经济之本。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由于产业基础共性技术缺失,工业基础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强,^②中国产业基础能力较为薄弱,长期处在价值链中低端。为此,需要加快建设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是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引领作用,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推广应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和新商业模式。二是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加强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迭代创新,前瞻性部署数字基础设施,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加快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三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持续强链、补链、稳链,构筑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体系,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加快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第五,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营造良好国际环境。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而制度型开放的核心就是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先进技术、数据、高技术产品和服务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一是要对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制定与国际接轨的服务业国家标准。二是要持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三是要充分发挥自贸区先行先试作用,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全球创新资源,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

责任编辑:张超

①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10 月底,科创板全部 562 家上市公司均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

② 徐金海、夏杰长:《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改革》2023 年第 8 期。

(上接第 86 页)

感受,增强纳税的社会责任感,从而自我规范纳税行为。积极宣传依法纳税先进单位和个人,树立纳税榜样,使纳税人认同税收文化、提升税收道德水平;完善个人征信系统,将纳税行为纳入征信系统,强化纳税信用评价结果应用,提升社会监督在税收行政中的作用。

第三,在税收互动中培养税收素养。税收征管者是纳税人对税务机关产生直观认识的重要来源,纳税人在与税收征管者互动过程中形成对税收制度的公平性、公共服务供给有效性及政府行为的认识对个人税收素养塑造起到关键作用。税收征管者应增强服务意识,为纳税人提供公平、确定的税法解释和服务,降低纳税人缴税过程中的各项成本,为纳税人主动依法纳税提供激励和便利,营造人性化税收征管秩序。税收行政政策需要从以管为主向多元共治转变,公众参与权和监督权等权利可以通过建立及时高效的政民沟通平台等方式体现,通过社会参与的形式强化纳税义务和民主监督。

现阶段受税收素养的限制纳税人参与税收治理的程度并不充分,在税收共治格局中与其他参与主体相互交往中的平等关系尚未充分体现,义务履行和权利行使都不够全面。从税收知识、纳税意识和社会责任三个方面提升纳税人整体的税收素养,有助于改进纳税人参与税收协同共治的质量和效率,从提升政民协同效率、提升征税效率、促进多方共治等方面推进税收治理现代化,形成全社会协税护税的氛围,确保依法治税得到贯彻落实,实现税收治理善治目标。

责任编辑:许磊

Main Abstracts

The Encounter of Young Marx and French Communist Thought

Pan Zhongwei and Ji Shuyang 23

The self-consciousness philosophy of young Marx during h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established an ideal country dominated by reason, which meant a union of free men. In the process of striving to make this rational country a reality, young Marx encountered a “troubled question”. The poverty that existed in Germany at that time, as well as the non-freedom and inequality brought by Private property, exposed the contradictions that the theory of rational state itself could not overcome, and also shook young Marx’s confidence in this theory. So, the French communist thought, which explored the same issue, began to truly incorporate into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young Marx. Young Marx did not fully accept French communist thought, but instead, based on Feuerbach’s philosophy, made efforts to integrate French communist thought into a more complete and systematic theoretical system of communism. The encounter between young Marx and French communist thought was a process of independent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theoretical transcendence, as well as a proces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philosophical critique and practical critique.

From the Revealing of Transcendental Illusions to the Search for Philosophical Principle ——Schleiermacher’s Reorientation of Dialectics

Zhou Xiaolong 49

Dialectics is at the root of Schleiermacher’s philosophy. He developed dialectics as a universal and fundamental tool for philosophical thinking. Schleiermacher broke with Kant’s definition of dialectics in theoretical philosophy as “logic of illusion” by borrowing Spinoza’s philosophy of the Substance to fight with the dualism of Kant’s philosophy. The core idea of Schleiermacher’s dialectic is the unity of logic and metaphysics, which unifies the form of knowledge and the content of existence, and the supreme principle he explored is both transcendental, namely, the condition of possibility of knowledge, and transcendent, namely, the supreme ground of existence. Schleiermacher significantly broke through the limits of Kantian philosophy through dialectics and stayed in an extremely complex dialogue with various philosophical systems of the post-Kantian era.

On the Rule of Law Guarantee for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Shi Youqi and Li Kunpeng 57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mbining wealth is highly related to the rule of law. The two have consistency in value orientation and goals pursuing. The literal meaning of common prosperity is to satisfy people’s demand for better living rights and their guarantee for the rights, which enriches the legal connot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the new era, and promotes the practice of the rule of law of good law and good rule of law. The rule of law provides guidelines for common prosperity, consolidat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and create a good environment. In the new era, in order to realize common prosperity, we need to improve the legal norm system that promotes each other with common prosperity,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strict regulation and justice and civilized law enforcement,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justice, promote and guarante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peopl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Meanwhile, we also need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power of law, which could strengthen foundation, stabilize expectation, and promote long-term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effectively transform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into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To Strengthen New Driving Force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y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Shen Kunrong, Cheng Guo and Zhao Qian 87

The concept of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is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Distinguished from traditional productivity,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take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of which “new” emphasizes new technologies, new industries, new formats, new models and new driving forces, and “quality” emphasizes new quality and new material form.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is not only a proactive choice to boost

the recovery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the top priority to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of the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but also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us possessing a distinct contemporary setting.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will help transform the growth model and replace old growth drivers with new ones, develop the “three-new” economy and create new growth engines, and improve the adaptability of supply system to demand and expand effective demand. The key path to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is to break through the “bottleneck” problem of key technologies with disruptive technology and cutting-edge technology innovation, develop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arrange future industries prospectively, thus achieving the transition of productivity. Productive relations should adap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basic research and buil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develop new human capital and strengthen support for high-level talents, improve modern financial system and enhance the financial sector’s ability to serve substantial economy,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nd consolidate the industrial foundation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expand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steadily and foster a sou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Commercial Lease of Land and Related Issues in the Manchuria-Mongolia Trea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Japan

Gao Qiang 111

In 1915, in the “Twenty-one Provision” requirement, Japan put forward that it should enjoy a “superior position” in the South Manchuria and East of Inner Mongolia. The Manchuria-Mongolia trea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Japan contained provisions on land lease and related issues. After the signing of the treaty, Japan tried to expand the geographical scope of the interests, and made every effort to turn the provisions of the treaty into real rights and interests, which became a typical manifestation of Japan’s immigration aggression and substantial land possession in Northeast China. However, Japan obviously underestimated China’s will and counter-ability to fight. Because the land rent and related rights and interests that Japan demanded seriously endangered China’s sovereignty, they were strongly resisted by China, which led to the failure of Japan’s aggressive plot to a great extent.

Exploration and Growth in the Early Founding Period of *Shenbao* Through Its Coverage of the Yang Yuelou Case

Gao Xinya 135

Shen Bao, as one of the earliest Chinese newspapers founded locally, emerg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and took root in Chinese society. It was shaped by a dual impa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concepts and Western modern journalistic ideal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early state and transformations of *Shen Bao*, utilizing the Yang Yuelou incident that occurred at its inception. By combining the reports on the Yang Yuelou case with the newspaper’s own growth, the study delves into aspects such as the newspaper’s writing style, cultural orientation, and news reporting. Through this analysis, it discusses the initial status and changes of *Shen Bao* at its founding and further examines how this early modern media outlet, in interaction with society, shaped its self-image and engaged in public affairs.

“Militarism” and “Loving Beauty”: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of Liang Qichao’s Aesthetic Enlightenment Discourses

Feng Qing 154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iang Qichao’s early and late aesthetic thoughts is a typical problem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aesthetics. In the context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ang Qichao’s enlightenment thoughts were embodied as “Militarism”. Liang’s governance theory based on novels aims to shape a radical political character of the people. After ente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ang proposed an aesthetic enlightenment view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mmon senses, reinterpreted traditional literary and artistic experiences, and tried to shape a personality of modern citizens who “love beauty”. Liang Qichao’s transformation of problem consciousness demonstrated the shifting of ideas from militarism to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 Liang Qichao’s two different aesthetic enlightenment discourses are actually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both embodying his intellectual ambition to transform national character and rebuild the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沈坤荣

沈坤荣，经济学博士，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系高级研究学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经济增长研究院院长，曾任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商学院院长。兼任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江苏省数字经济学会理事长，江苏省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理事会特邀理事，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宏观经济首席专家，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兼职教授。首批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江苏省“333工程”第一层次以及“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的专家。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特等奖获得者、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获得者、首届“刘诗白经济学奖”获得者。

沈坤荣教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转型经济、经济增长、资本市场等问题的研究。多年来，主持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近20项，出版《体制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增长》《新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研究》《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理与路径》《自主创新与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与动力》《中国的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等15部学术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中英文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研究成果曾3次获得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6次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和二等奖。